

华北学·华北自然环境研究丛书

GENZHI HAIHE YUNDONG YU XIANGCUN SHEHUI YANJIU

“根治海河”运动与 乡村社会研究（1963—1980）

吕志茹 著



人民出版社

华北学·华北自然环境研究丛书

GENZHI HAIHE YUNDONG YU XIANGCUN SHEHUI YANJIU

“根治海河”运动与 乡村社会研究 (1963—1980)

吕志茹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根治海河”运动与乡村社会研究:1963~1980/吕志茹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

ISBN 978-7-01-014879-3

I. ①根… II. ①吕… III. ①海河-治河工程-水利史-1963~1980
IV. ①TV88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0552 号

“根治海河”运动与乡村社会研究(1963—1980)

GENZHIHAIHE YUNDONG YU XIANGCUN SHEHUI YANJIU(1963—1980)

吕志茹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5

字数:370 千字

ISBN 978-7-01-014879-3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HB13LS013）

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河北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项目资助

《华北学研究丛书》出版说明

华北区域（京、津、冀、晋、内蒙古五省市区）是黄河文明与海河文明起源地，是历史上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等多元文化交往、冲突、融合的典型地区。古往今来，该地区曾为众多仁人志士不懈奋斗的中心舞台之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发生。近年来，随着国家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作为围绕京津的华北区域，其基础功能、辐射功能更加凸显。

河北大学位于素有“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门”之称的河北省保定市，具有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又是河北省内唯一与教育部共建的综合性大学和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入选高校。多年前，河北大学历史学科围绕华北区域开展了相关研究，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经过充分的酝酿与筹备，河北大学历史学科于2012年正式发起成立华北学研究所，在国内较早提出“华北学”这一概念，目前已取得一批标志性研究成果。华北学研究所“古今贯通，文理交叉，区域联合，服务华北”为宗旨，参照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模式运作，重点研究领域和拟出版《丛书》规划包括：

1. 《华北学·华北五省市区综合研究丛书》
2. 《华北学·京津冀一体化研究丛书》
3. 《华北学·人类文明起源与华北地区考古文物研究丛书》
4. 《华北学·华北自然环境研究丛书》
5. 《华北学·华北地区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丛书》
6. 《华北学·华北红色根据地研究丛书》
7. 《华北学·华北乡村研究丛书》
8. 《华北学·华北城镇研究丛书》
9. 《华北学·河北省研究丛书》……（华北各省市区）
10. 《华北学·保定研究丛书》……（华北各市县）

华北学研究为河北大学历史学科致力打造的研究特色和重点建设领域。正是基于此，河北大学华北学研究所推出《华北学研究丛书》，其旨趣在于，

“根治海河”运动与乡村社会研究（1963—1980）

从纵向上，贯通古今，古为今用，发掘历史文化遗产，服务于华北区域的崛起与振兴；从横向上，积极应对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加强区域协同研究，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该《丛书》将不断推出海内外同仁有关华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贡献社会。

未来的华北学研究，目标明确，形式多样，力求实现校内与校外资源互补，强势与特色扬长补短。我们热切期盼更多的同仁关注、襄助华北学研究。

河北大学华北学研究所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根治海河”运动的必要性	20
第一节 海河流域的灾害	20
一、灾害发生的自然条件	20
二、灾害发生的人为因素	26
三、1963 年前的灾害状况	29
第二节 海河流域的治理	32
一、清代以前的治理	32
二、民国时期的治理	35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理	38
第三节 “根治海河”运动的发端	44
一、“根治海河”目标的提出与实施	44
二、“63.8”特大洪水	49
三、“一定要根治海河”	52
第二章 “根治海河”运动的展开	58
第一节 “根治海河”运动的准备	58

一、规划设计工作	58
二、领导机构的建立	63
三、序幕:宣惠河治理	70
第二节 “根治海河”运动的进程	75
一、1973 年前河道工程概况	75
二、1973 年后河道工程概况	83
三、建筑物工程与水库工程	86
第三节 “根治海河”工程的特点	90
第三章 “根治海河”运动的政策	99
第一节 出工政策	99
一、“生产队集体出工,义务劳动,国家管饭,不计工资”	100
二、出工补助	104
第二节 粮食政策	109
一、“国家管饭”与自带口粮指标	110
二、粮食补助政策的演变	115
三、粮食补助政策的反思	121
第三节 占地移民政策	126
一、河道占地移民政策	126
二、水库占地移民政策	133
第四章 “根治海河”运动的舆论动员与组织管理	139
第一节 舆论动员	139
一、治河民工的发动	139
二、政治挂帅:贯穿始终的思想政治工作	145
三、树样板:典型引路	154
第二节 施工管理	160
一、施工中的技术进步	160
二、施工中的“包干负责”制	164

三、施工中的领导力量	170
四、“勤俭治水”的悖论:施工管理中的问题	177
第三节 后勤保障	187
一、工程物资供应	187
二、生活物资供应	190
第五章 “根治海河”运动与农民	196
第一节 民工的群体状况	196
一、民工的地域分布	197
二、民工的身体条件	204
三、民工的成分及性别	207
第二节 民工的日常生活	219
一、民工的劳动	219
二、民工的伙食	229
三、民工的衣住行	238
四、民工的医疗与文化生活	246
第三节 农民的态度与贡献	251
一、民工的出工动机	251
二、民工的合作与抵制	258
三、群众的合作与抵制	264
四、农民的贡献与牺牲	269
第六章 “根治海河”运动与农村	274
第一节 “根治海河”运动中的农村社队	274
一、“根治海河”运动中的公社	275
二、“根治海河”运动中的生产队	278
第二节 “根治海河”运动中生产队的压力	281
一、生产队的粮食负担	281
二、出工中的额外补贴	288

三、支持工地的坚强后盾	293
第三节 “根治海河”运动对农村的影响	298
一、对农村的正面影响	298
二、对农村的负面影响	300
三、投资方式与农村发展	310
第七章 “根治海河”运动与农业	319
第一节 “根治海河”运动的作用	319
一、“根治海河”与排水	319
二、“根治海河”与抗旱	326
第二节 “根治海河”运动与农业发展	329
一、配套工程与机井建设	329
二、“根治海河”与生态变化	338
三、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347
结 语	356
参考文献	367
后 记	381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发展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水利设施的兴修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由于我国水灾频发，自文明出现以来，治水便成为神话时代中国人的主题。之后，历代王朝都把水利建设看成治国安邦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新王朝初建时尤其如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水利建设的认识更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毛泽东在 1934 年阐述中央苏区的经济政策时，就明确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① 的论断。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长期战乱留下的水利失修、水灾频发的局面，党和国家下大决心进行全面、彻底的治理，不仅加强了对江河水患的治理力度，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也逐渐展开，在水利建设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的集体化时期，国家在统一规划水利工程、人员调配方面显现出明显的优势，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为防灾减灾以及农业的增收、国民经济的全面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海河是我国七大江河之一，干流流经天津市区，总长只有 73 公里，上游却连接着众多河流，形成广阔的海河水系，呈扇面状分布在华北平原上。各大支流源于太行山、燕山，穿过华北平原，汇集天津注入渤海。海河流域西部与黄土高原接壤，南界黄河，北接内蒙古草原，东临渤海，主要流经河北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2 页。

省大部、北京市、天津市的全部，以及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辽宁等省、自治区的一部分。该流域涵盖了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就是这样一个重要区域，却由于特殊的气候及地形条件，导致旱涝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相关省、区、市加大了对海河的治理力度，除进行了部分平原除涝工程外，还修建了官厅水库，进行了综合治理规划的编制工作。“大跃进”时期，在海河上游山区又修建了十几座大型水库和大量中小型水库，在海河治理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实践证明，海河治理虽取得了显著成绩，仍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灾害的威胁。1963年8月，海河流域降下特大暴雨，降雨量创下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引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冀中、冀南一片汪洋，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京广铁路停运二十多天，并威胁到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水灾的巨大破坏力促使党和国家下决心对该流域进行彻底的综合治理。1963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一场声势浩大的“根治海河”运动全面铺开。这次治理活动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其参与劳动的人员之多、规模之大是历史上罕见的，在海河治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根治海河”是党和国家领导的一场有长期规划的大型治水运动，是当代水利史上的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修建了诸多水利工程，“根治海河”是集体化时期水利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典范。经过相关部门和民众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70年代末，海河各大水系都有了单独入海通道，“在未破坏原有海河水系格局的情况下，陆续开挖、整修、扩挖了许多直接排洪入海的新河道。从此，在海河流域平原上，出现了统一入海的海河水系与分流入海的分流水系并存的水网格局。”^①它不仅减轻了洪水灾害对天津市和京广铁路、津浦铁路的威胁，而且注重了综合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该流域的农业基础条件，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海河流域的农业发展有了更大的进步，

① 邹逸麟、张修桂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页。

这与“根治海河”运动期间打下的良好水利设施基础是分不开的。本书将以“根治海河”运动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为视角，阐释集体化时期水利建设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影响，以思考水利与民生的关系。

（一）理论意义

“根治海河”是集体化时期开展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集体化时期的水利建设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史学界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尚比较薄弱，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治理政策上，它突破了传统社会大型水利工程中“国家出钱，农民出力”的治水模式，由国家、集体和民众三方联动，充分发挥了集体的后盾作用，在农民做出巨大贡献的基础上，取得了以往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是计划经济下治水的有效模式。“根治海河”正处于人民公社化时期，对该项运动的组织机制、社会动员和资源配置能力、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进行研究，能够对特定时期的整个社会面相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探讨。同时，“根治海河”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下进行的大型水利工程，对该流域经济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此，对“根治海河”运动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华北区域地方史和集体化时期水利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还可以从水利建设的角度深化对国史、中共党史和当代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利事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从20世纪70年代起，党和国家对水利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由“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提高到“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进入21世纪后，中央更为重视粮食安全问题，要求进一步建立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水利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的农村在水利方面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在吃集体化时期的“老本”。因此，对集体化时期水利史的研究，有利于总结既往经验，为新时期的水利建设提供经验借鉴。水利部前部长钱正英曾经说过，水利建设“宜未雨绸缪，勿临渴掘井”。重大治水方略的实现，不是短期就容易完成的，应在总结既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前筹划。

“根治海河”是对海河流域的综合治理。水利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党的

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求人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总结“根治海河”中工程规划的合理成分、治理理念，对当今处理水利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另外，水利建设是涉及“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根治海河”运动与“三农”关系的研究，能使我们深入分析水利建设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合理利用乡村资源，更好地为“三农”状况的改善服务。

二、学术史回顾

学术界对水利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古代和近代。如著名水利研究专家姚汉源先生的《中国水利史纲要》^①与《中国水利发展史》^②均以1948年为下限，很多专题研究也多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以前。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水利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开始有了较大的进步。

（一）对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史的宏观研究

综合性研究：201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瑞芳的新著《当代中国水利史（1949—2011）》，对新中国成立以后60余年的水利建设进行了全面梳理，弥补了大量水利史著作以1948年为下限的不足。该著覆盖面广，从江河治理和农田水利建设两个基本维度，揭示了新中国治水方针的转变及由此带来的水利建设重心的转移，清晰地勾画出当代中国水利建设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对水利建设的利弊得失做了客观评判，是全面研究当代水利史的重要著作。但由于侧重点在全局，其中所涉及的“根治海河”部分仅限于粗线条的概括。

其他有关新中国成立以后水利史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大江大

① 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河治理的研究；一是对小型农田水利^①的探讨。二者既有区别，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定区域的生态系统中，“水利建设的有效性恰恰在于大水利与小水利之间是否构成一个协调与互补的系统。”^② 1963 年大水灾后海河流域的治理属于国家领导完成的大型水利工程，但在骨干河道进行治理的同时大力加强了配套工程建设，使其在防洪的同时兼具了除涝和抗旱的双重功能，正好体现了这一原则。以下对两种类型的水利研究都将予以关注。

江河治理研究：有关江河治理等大型水利工程的研究，重要的著作有高峻的《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③。该著由追溯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治水实践入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水事业进行了历史考察。记述了新中国治水方略的制定，国家领导下对淮河的初步治理、对黄河水患的防治和规划，以及长江分洪工程的兴建等，最后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治水的主要经验，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利发展的重要著作。但其研究理路重在传统的水利史方法，主要关注国家治水方略的制定与水利工程建设，对于水利建设中的施工政策与民众的参与，仅在总结治理淮河的成就和经验教训中提到对参建民工实施按劳取酬制度、奖罚分明，激励了民工施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尚未对国家在水利建设中的出工政策、参与民众的状况展开论述。该著的研究截至 1957 年，人民公社时期的水利建设不是其考察的范围。

对大型治理工程的专门研究中，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工作取得的成就较多。除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性追述外^④，以葛玲为代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淮运动^⑤进行了探讨。作者以皖西北为例，在大量地方档案的基础上分

① 对于农田水利的概念，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义。吕亚荣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制度模式及绩效评价》中认为：农田水利设施的范围，即是指辐射和服务范围窄、规模小、建设和投资额度少，受益对象有限、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水利设施。与大中型水利设施比较而言，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承担的社会、经济责任和作用较小，涉及的利益主体关系简单。转引自李文、柯阳鹏的《新中国前 30 年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基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变迁的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 年第 6 期。

② 罗兴佐：《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荆门五村农田水利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7 页。

③ 高峻：《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④ 王光宇：《安徽治淮的回顾与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9 期。

⑤ 葛玲：《新中国成立初期皖西北地区治淮运动的初步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析了治淮运动的兴起和工程实施中乡村与政府间的互动，对中共领导的水利工程中的“政治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党史、政治史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淮河治理上的得失，认为在将治淮推向政治漩涡的同时，弱化了工程的水利效益。该文突破了传统水利建设的层面，以治淮运动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为视角，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水利政治的形成和影响，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利建设的政策及实施状况。此外，刘彦文对“大跃进”时期甘肃引洮工程的研究^①不仅探讨了该工程的实施状况，而且重点关注了民工的阶级成分。^② 上述学者的研究均强调了水利与政治、社会的互动，突出了社会环境对水利建设的影响，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史研究，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农田水利研究：有关农田水利建设，重要的著作有罗兴佐的《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荆门五村农田水利研究》。该著作以江汉平原荆门市五个村庄为考察对象，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水利建设分三个时段加以考察，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到分田到户的农村改革阶段、联产承包制至2002年税费改革前以及2002年税费改革以后。对于第一个阶段，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经过人民公社化后，国家在农村建立起以政社合一和集体所有为突出特点的高度集权的组织与管理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国家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控制，强制人们合作，农民合作问题实质上变成了国家的一个组织问题。”^③ 作者指出，几千年来存在的农民合作问题，在国家政权建设取得成功的条件下得以解决。人民公社体制为治水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基础。作者将国家—社会理论作为研究新中国治水的视角，研究国家的制度层面与民众的应对，强调了水利建设中“人”的因素，是对传统水利史的有益补充。但作者对集体化时期的水利研究仅用一章来表述，论述略显单薄并缺乏实证材料。对于新中国的农田水利政策，罗兴佐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农田水利建设

① 刘彦文：《“大跃进”时期的甘肃引洮工程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

② 刘彦文：《“大跃进”期间引洮工地的“五类分子”》，《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

③ 罗兴佐：《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荆门五村农田水利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分成三个阶段，经历了农业生产为取向、农民负担取向、市场化与自治性取向的政策。集体化时期的水利政策是以农业生产为取向的。^①

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田水利政策，李文、柯阳鹏在《新中国前30年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基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变迁的分析》一文中认为：集体化时期的水利筹资方式有两种：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一切小型水利工程，均由合作社其后是人民公社依靠自身的资金和劳动积累解决。这种民办公助的建设和供给方式在合作化和集体化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稳定和发展。^② 该文重点关注小型的农田水利，对大型水利没有论及，仅为简单概括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著名学者黄宗智在其《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对集体化时期的水利建设进行过论述，他认为集体化为新的水利建设提供了实际上免费的劳动力，国家提供了现代资本投入，诸如电泵、水闸和新海塘所需的水泥，但是这些工程是由农民的“义务工”完成的。^③ 这是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利设施兴修得出的结论。至于各地在兴修不同规模的水利工程时所实施的具体政策，以及民众在水利建设中如何具体参与，如何被组织起来，尚未有专门的著作论及。而集体化时期，随着大规模水利建设的兴起，民众的生产生活与水利建设密不可分，水利建设成为理解这一时期农村民众社会生活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此外，近几年来，一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开始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农田水利问题作为选题，丰富了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史的研究。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对集体化时期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水利方面，周亚以晋南龙子祠泉域为考察对象，对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水利与社会变迁进行论述，该文立足于集体化时期，把研究视域放开，对唐宋、元明清、民国和集体化各阶段的水利建设进行纵向研究，对水利社

① 罗兴佐：《论新中国农田水利政策的变迁》，《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8期。

② 李文、柯阳鹏：《新中国前30年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基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变迁的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6期。

③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5页。